

揭露国民党的封锁行径

——《宋庆龄致梁先生》函的来龙去脉

朱贤磊

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有大量亲撰英文函底稿存世并陆续得以翻译刊发，成为宋庆龄生平及其思想研究的重要史料，受到有关研究者的关注。但宋庆龄的不少英文函译稿尚来不及补充必要的注释，有些连收信者的姓名身份也还语焉不详，这对理解和掌握信函的重要内容造成了困难。本文讨论的《宋庆龄致梁先生》（1944年2月17日），就是这样一封书信，最早收录于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馆藏宋庆龄来往书信选集》。该函全文如下：

宋庆龄致梁先生

（1944年2月17日）

亲爱的梁先生：

我刚看了今天的《国民先驱报》中的一篇中央新闻报导，在你们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中，你引用了我的话，说我从没有对加于北方游击地区的封锁表示过抗议。

我自己的救济工作包括为那些地区的战士们运去医疗物资，但正如在我们会见时我告诉你的，这项工作，由于对游击地区的封锁而经常中断。大约在四年前，八吨急需的医疗物资就被阻止运往目的地，最后被全部没收。这以后的三年多里，我们一直无法把一些物

资运往上述地区，直到去年夏天，周恩来先生和林彪将军乘坐的卡车得到免于检查的待遇，才给了我们向那里的医院运送可维持几星期的医疗物资的机会。

我想再强调一下，以前那些被没收的物资，都是国外的捐赠者指定要运往那些地区的。对于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这些物资不能运送到那里，我当然应该让他们知道。虽然我没向雷诺新闻处提供任何消息或明确向英国工会呼吁，但我对这些事情并没有保持沉默。

1943年，宋庆龄（一排居中）在重庆与国际友人察看运输的医药用品



我不能否认，在过去的四年里，我们千百万的战士被剥夺了他们应该得到的医疗援助，尤其自从1938年以来，他们得不到由我和纽约的美国援华会、英国的中国运动委员会共同发起的对国际和平医院的医疗捐助，许多中国人和外国人为国际和平医院作出了牺牲，白求恩大夫和印度的柯棣华大夫为此献出了他们的生命。

你诚挚的宋庆龄

(据英文原件)

由于收录时该信函没有任何注释，读者无从知晓“梁先生”是谁，也无法了解宋庆龄是如何揭露国民党当局对抗日根据地的封锁的。

笔者梳理了宋庆龄该信函陆续刊行的各版本、当时报刊报道以及美国在华外交官的多份报告等资料，希望厘清如下各点：究竟这封信里的“梁先生”是何许人也？宋庆龄的言论为何被“梁先生”在新闻发布会上“引用”？她如何顶着巨大的压力向外界揭露国民党的封锁行径并产生了哪些影响？

“梁先生”的身份 和新闻发布会的内容

继1995年出版的《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馆藏宋庆龄来往书信选集》之后，上述《宋庆龄致梁先生》被收入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的《宋庆龄书信集》，题名直接为《致梁先生》，信函出处标明“据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馆藏英文原件”，译文除个别字词外，基本未作改动，除此以外，没有任何注释，没有说明“梁先生”的全名与职衔等，在该书中，也没有其他梁姓通信人。

2006年8月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盛永华主编的《宋庆龄年谱（1893-1981）》，1944年2月17日条下为：“致函《国民先驱报》的梁先生，驳斥该报所谓她对运送游击地区的医疗物资被没收保持沉默的说法。”谱文出处注为《宋庆龄来往书信选集》第47-48页。除页码有误外，该条谱文把“梁先生”与《国民先驱报》相连，恐怕是对该信函有关内容的一个“误会”。

2012年，在宋庆龄逝世31周年之际，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重新编辑出版了《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藏品系列——宋庆龄书信选编》，请专家对英文书信和电报译文作了进一步的修订。这封《致梁先生》也收录在其中，信的中文翻译核心内容基本不变，但



梁寒操与夫人合影

将“虽然我没向雷诺新闻处提供任何消息或明确向英国工会呼吁……我们千百万的战士被剥夺了他们应该得到的医疗捐助”一段，改为“虽然我没向《雷诺新闻》提供任何消息或明确向英国劳工发出呼吁，但我也绝没有对这个问题保持沉默。我不能否认过去四年中使我们成千上万的战士被剥夺了他们本该得到的医疗援助的原因，特别是鉴于自1938年以来，我与纽约的美国援华会及英国的中国运动委员会一道，一直是国际和平医院的发起人”。这些修订进一步突显了宋庆龄彻底揭露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抗日根据地进行封锁的鲜明立场。书中将这封信的名称直接改为《致梁寒操》，并在注释中说明：“梁寒操（1898-1975），时任国民政府中央宣传部部长，每周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代表国民党对外发布新闻”。但并未注明相关的依据和理由，而对于宋庆龄这封信的内容也未做任何说明。

笔者从宋庆龄信中所提及的这场新闻发布会入手，查阅了有关资料，发现了“梁先生”真实身份的确凿依据。

关于1944年2月16日召开的这场新闻发布会，2月17日重庆出版的《中央日报》，只有如下一则简讯：

外国记者招待会昨日举行

【中央社讯】外国记者招待会，十六日下午三时举行，梁部长寒操、吴次长国桢、张参事平群出席主持，至四时许散会。

重庆的《大公报》对此的报道也同样简略，内容亦出自中央社：

外记者招待会昨日下午举行

【中央社讯】外国记者招待会昨日下午三时举行，梁部长寒操，吴次长国桢，张参事平群出席主持，至四时许散会。

这两篇报道都明确提到，国民党宣传部长梁寒操、外交部政务次长吴国桢和国民政府参事张平群出席了1944年2月16日的新闻发布会，但都没有提及此次发布会的主题、与会外国记者提出了哪些问题，梁寒操等作了哪些说明和回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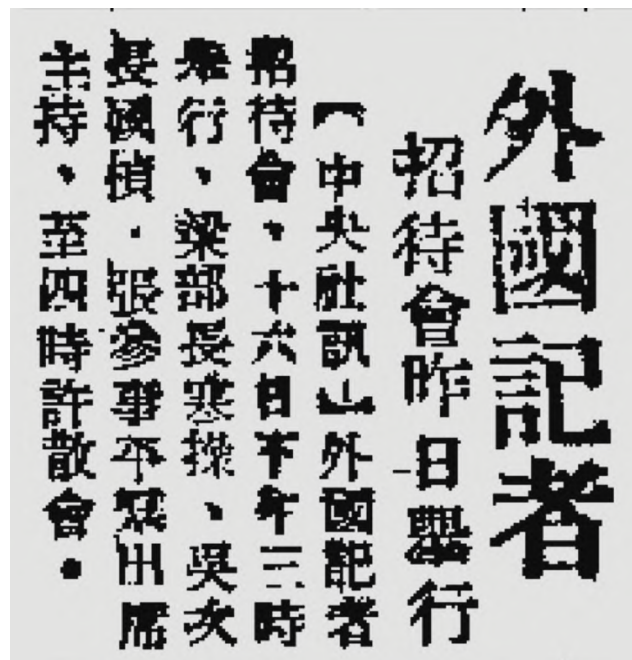
笔者在整理《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4年中国卷（*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4 China*）时，发现了有关这次新闻发布会的多份文件。如1944年2月23日，美国驻华大使高斯在给国务卿赫尔的电报中汇报了“在2月16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被外国报刊记者质问封锁中国北方共产党区域的问题”。据文中记录，“中国的每周例行记者会通常由宣传部长，外交部政务次长和一位行政院参事以政府发言人的身份出席，近几个月来，有越来越多的外国报刊驻重庆记者提出有争议的问题。中国的新闻机构和报纸也有代表出席发布会，但是他们显然对参与争议并不积极”。在2月16日的发布会上，“宣传部长梁寒操先生（Liang Han-tsao）和外交部政务次长吴国桢博士（K.C.Wu），否认中央政府封锁共产党区域。前者说前共产党驻重庆代表周恩来将军，已经离开重庆去了延安（1943年6月），并且第18集团军的往返交通畅通无阻（想来是指从共产党区域到中央政府所在地）”。电报还描述了这场新闻发布会后的奇怪现象：“虽然中央新闻社英语服务部刊登了发布会内容的删节版，外国报刊记者被允许发送发布会相关主题的报道，中国媒体则没有提及新闻发布会的主题内容。”由电文可见，梁寒操、吴国桢和一位行政院参事出席了1944年2月16日的新闻发布会，且因封锁中国共产党控制地区的问题而受到外国记者的质问，宋庆龄1944年2月17日《致梁先生》函，正是发给梁寒操的。

高斯大使在给美国国务卿的报告中，较多涉及宋庆龄信中提到的新闻发布会的状况。如他在2月23

日致国务卿赫尔的另一封信件中写到：2月16日的这场新闻发布会涉及的内容包括“中央政府封锁共产党区域，蒋介石新书《中国之命运》翻译版的出版和孙中山夫人给美国出版物写的信，即一篇已于近日刊登在英国周刊上的报道。”宣传部长梁寒操和外交部政务次长吴国桢在发布会上否认了国民党中央政府封锁中国共产党区域。会上记者们就中国共产党军队的供给状况等进行了提问，场面一度十分尴尬，最后记者们提交了正式的签名请求，希望蒋介石能允许他们到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区域去。

梁寒操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宋庆龄并没有向英国和美国劳工发送呼吁，请他们声援解除国民政府对游击区的封锁。并且他还读了宋庆龄给《新大众》的致词，说文中并没有关于“反动势力”和“封锁”的内容。但据高斯1944年2月23日及2月28日的电报记载，发布会后，宋庆龄亲自写信给梁，并与外国媒体记者协会作了沟通。她说，虽然她没有专门发表过关于封锁的声明，但是她没有向梁或是其他人否认过封锁的存在。据称宋庆龄对这件事“非常恼火”，梁在拜访她讨论这个话题时，她说“下次你见到我有可能是在

1944年2月17日《中央日报》第二版刊登的《外国记者招待会昨日举行》短讯



监狱”。她抗议梁的说法，梁指她从来没有揭发过中央政府的封锁。她说自己“已经这样做四年了”，并补充道：三年里，因为不能在重庆当局不允许输送物资的地区开展救济工作，她曾向国内外的救济机构和朋友们写信抗议这种封锁，现在如果她否认封锁，就是否认她之前抗议的真实性。

高斯在给赫尔的信中曾附上了宋庆龄2月17日写给梁寒操的信，虽然信的内容未刊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中，但显然，在高斯看来，宋庆龄这封信的内容非常重要。

宋庆龄揭露封锁的声明

关于宋庆龄《致梁先生》函及梁寒操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到的宋庆龄给美国出版物写的信和刊登在英国周刊上的报道，详细的事件经过高斯在2月16日写给国务卿的电报中也有提及：事件的起因，是英国的《雷诺周刊》（*Reynold's Weekly*）上发表的一篇报道称，宋庆龄向美国机构呼吁“消除对中国共产党的封锁，使他们获得医疗和其他供给，并且得到均等的抗日机会”。高斯大使在这封电报里附上了二等秘书谢伟思拜访宋庆龄后整理的备忘录。据谢伟思记载，宋庆龄在与他会面时说，重庆方面见到《雷诺周刊》上的文章后，吴铁城、何应钦和张治中分别拜访了她。他们指责她“散布无根据的谣言”“向洋人求教”和“向外国新闻界暴露中国的家丑”等等，而宋庆龄则表示她确实曾给美国朋友和支持者写过有关封锁的材料，但她指出，“人人都清楚这是她的看法，她的组织——保卫中国同盟主要关注向共产党控制地区运送救济品”。宋庆龄说她的家族也对此“非常愤怒”。针对她及冯玉祥等一些国民党高级将领的行动受到限制、中国战况、中美关系、中英关系、外交部长的人选变化等一些问题，宋庆龄也向谢伟思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高斯在电文中评论：“这一事件可能使孙夫人的处境比从前更像囚犯……不幸的是，外国机构引用了她的话，这话对她的处境十分不利。”关于这起事件的导火索——《雷诺周刊》上的报道，即宋庆龄揭露国民党封锁中国共产党控制区域的内容，美外交部的一位官员已通知驻华大使馆，可以参考2月14日出版的《时代》周刊（*Time*）。可以想见，国民党政府对这篇报道的内容自然也不会高兴。

这篇刊登在《时代》周刊的报道（*Voice from*



1944年2月14日《时代》杂志上刊登的宋庆龄关于国民党封锁的言论

Chungking, Time, February 14, 1944: 37；宋庆龄呼吁取消对中国共产党的封锁[J]. 档案与史学, 1995(4):77-78. 该文翻译了1944年2月14日《时代》周刊中宋庆龄声明的相关内容，本文采用其译文）如下：

发自重庆的声音

纤小、文雅的孙中山夫人很少说话，但是，一旦为其已故的丈夫的自由民主方案直言时，她的话却如浓茶一样强韧有力。

在上周传到美国的一份材料中，这位有权有势的宋氏家族（姐妹：蒋介石夫人和孔祥熙夫人；兄弟：子文和子良）中的独立分子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的反动派和法西斯主义势力很强……下述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我们国家军队中的一部分被转用于封锁和紧盯游击区；一些人仍置私利于国家公益之上，镇压农民；缺少真正的劳工运动……中国的一些反动分子正在准备（内战）以便消灭我们斗争中的民主部分。这一部分是陕北和敌后游击区……”

这一声明是对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政策的直接抨击，并要求美国像供给重庆国军那样供给共产党。在重庆，除了委员长这位反叛的大姨子外，没有人敢用这种口气提出中国最具爆炸性的问题。至于孙夫人，她肯定是感到不得不这样讲的紧迫性。

委员长的军政部长，不被人尊敬的、反共的何应钦将军告诉《纽约时报》记者布鲁克斯·阿特金森：“不会有内战……委员长用和平和政治手段解决中共问题的计划正在取得令人满意的进展，非常有可能成功。”

宋庆龄的这一声明直接抨击了国民党政府封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北和敌后游击区，企图挑起内战的阴谋。高斯大使当时便指出，宋庆龄的声明当然地引起了她的家族和国民党高层的不满，使得她无法获准接受美国救济团体的邀请，赴美接洽救济工作。实际上，当时国际上包括美国援华联合会在内的许多救援组织在向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游击区运送药品物资时，都遭遇了国民政府的封锁和阻挠，只是他们虽然很同情中国共产党军队的处境，却都普遍认同向这些地区运送物资会遭到当局歧视而一筹莫展，结果是无论公开地还是秘密地，没有一点机会能向游击区运送物资。在这样的背景下，一石激起千层浪，宋庆龄的声明很快引起了外国友人、记者对国民政府向游击区采取封锁政策的高度关注，美外交官甚至非常好奇“孙夫人是如何将声明送到美国的”。国际舆论的哗然使得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在官方的新闻发布会上，对这一声明进行所谓的“解释”。

宋庆龄在新闻发布会后对《雷诺周刊》上的报道作了澄清。她解释了虽然“没有写过任何致词给《雷诺周刊》，但《雷诺周刊》上的报道是根据她给英国朋友的信写的。无论如何，宋庆龄在反对国民党政府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游击区采取封锁政策这一点上，一直以来都立场鲜明，她的观点众所周知。也正是由于她的坚持和努力，使得国民党的卑劣行径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感。正如高斯在1944年3月27日致国务卿赫尔的信中所说：“没有一个中国要员敢公开甚至是暗示中国当下的问题，除了孙夫人。”

抗议的余波

虽然梁寒操在新闻发布会上否认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区域被国民党中央军队封锁，否认运向该地区的

医药物资被禁止，但是他承认，曾听说运向这个地区的医药物资被没收。新闻发布会后，在外国记者的质询下，重庆当局“同意向陕西边区运送两卡车医疗物资”，美国大使馆评论“对于报道的宣传归功于孙夫人的一篇关于共产党区域存在封锁的声明”。很明显，这一声明即指上文中发表在《雷诺周刊》，后被《时代》引用的宋庆龄的言论。

面对国民政府的重重封锁，除了向国际社会揭露无法运送物资去游击区的真实原因，宋庆龄及其领导下的保卫中国同盟也以实际行动作出不懈努力。据统计，仅1939年至1940年2月，保盟获得的指定给新四军的捐款就有14900.8港元和23056.62元法币，指定给八路军的捐款有22411.5港元和116415.25元法币。除此以外，保盟还设法捐助了大量药品，医疗器械、食品、毛毯、冬衣、蚊帐等物资给八路军和新四军。也就是在《时代》上刊出宋庆龄的声明之前不久，她还指示在重庆的广东救济委员会拨出所收外国捐款——40万法币的三分之一，给在香港北部和东部活动的中国共产党，用以救济他们控制下的地区。高斯在给国务卿的电报中称：“只有依靠她（宋庆龄）的声望和影响力，保盟才能在共产党控制区域开展工作。”

宋庆龄1944年写就的这封《致梁先生》函，反映了宋庆龄抗战时期救济工作的初衷——“哪里最需要帮助，就帮助哪里”（宋庆龄：《永远和党在一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页），其目的是为游击区争取公平的医药、物资援助，从而有力地支援抗战。在这封信中，宋庆龄深刻揭露并强烈抗议国民党对北方游击区的封锁，向舆论公开了封锁的程度和游击区的现状，呈现了中国抗战力量的真实状况，“使国外友人得知中国战斗的进展以及中国伤员、孤儿和难民的最大需要”（《永远和党在一起》，第27页）。她在澄清有关自己报道的同时，进一步强调了自己和国际救济团体在这方面长期以来的努力，展现了她不屈不挠地与国民党反动势力进行顽强斗争，并始终坚守初心的决心和勇气。

（谨以此文纪念宋庆龄为中国共产党发挥抗日中流砥柱作用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作者单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陵园管理处）

责任编辑 周峥嵘